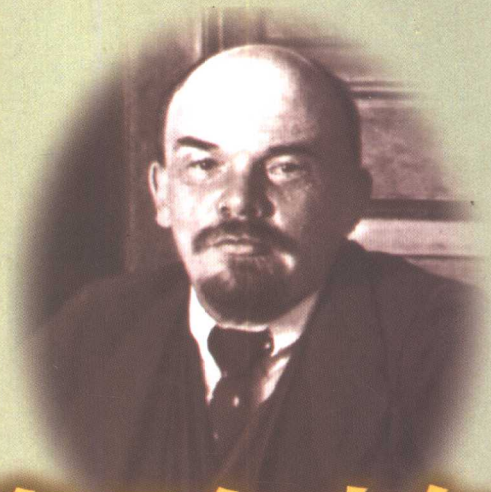


回顾与反思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 被篡改的 列宁遗嘱

〔俄〕尤·阿·布拉诺夫 著 张志强 赵志鹏 译

ТАЙНЫ ЛЕНИНСК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ЗАВЕЩАНИЯ”

Ю. А. БУРАНОВ

新华出版社

# 被篡改的列宁遗嘱

[俄] 尤·阿·布拉诺夫 著

张志强 赵志鹏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篡改的列宁遗嘱/ (俄) 布拉诺夫著; 张志强、赵志鹏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1

(回顾与反思·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ISBN 7-5011-4301-3

I. 被… II. ①布… ②张… ③赵… III. 政治斗争—苏联—  
史料 IV. D7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7632 号

ТАЙНЫ ЛЕНИНСК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ЗАВЕЩАНИЯ”

Ю·А·БУРАНОВ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专有权由作者授予新华出版社

**被篡改的列宁遗嘱**

[俄] 尤·阿·布拉诺夫 著

张志强 赵志鹏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25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301-3/D·689 定价: 12.80 元 (内部发行)

(提请读者注意: 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 序 言

早在八十年代末，当“改革”不可避免地走向其终点的时候，本书作者就已确信，弗·伊·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被篡改了。这里指的是所谓的列宁“遗嘱”，即列宁在1922年12月22日至1923年3月5日重病期间口授的书信和文章。

起初是对列宁的《值班秘书日志》的真伪产生了怀疑。轮流记《日志》的有斯大林的妻子娜·谢·阿利卢耶娃、秘书处领导人莉·亚·福季耶娃及玛·阿·沃洛季切娃。斯大林的妻子亲手在《日志》的首页上写道：“要随时锁起来。请将值班时间内所有的指示和事情记入本日志，并注明执行指示的情况。1922年11月21日。”然而，《日志》中却有不少遗漏之处：只记了日期，而事情的要点往往未记录下来。我到现在也不排除这样一种说法的可能性，即这或者是“第二本日志”（也就是说，它是后来搞出来的），或者是在1929年至1971年间被加进了令人生疑的内容的原《日志》。

也不能排除斯大林不再让其妻子参与记《日志》的

可能性（阿利卢耶娃最后一次记《日志》是在1922年12月18日）。

列宁逝世后，1929年4月29日，《日志》中粘贴上了由速记员沃洛季切娃签名的半页打字纸。她报告说，列宁在1922年底至1923年3月初口授的内容的全部速记记录都已被她烧掉了。但是，这段文字直到1967年才发表，那时列宁“全”集第45卷已经出版（本卷的编辑们未能准确地再现沃洛季切娃写下的文字）。

与《日志》有关的“游戏”持续了下去。《日志》是否被篡改过仍是个谜。不过，如果《日志》真被篡改过，那么《日志》中出现的沃洛季切娃1956年6月14日的第二份文字就自然而然令人产生疑问。她正是在这段文字中提到列宁发出了他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和总书记的回信。

最后，福季耶娃在1971年5月15日用两张打字纸的篇幅补充了《日志》。她肯定地说，《日志》中未记载列宁在1922年12月22日（两次）、25日、26日、27日、28日、29日（两次）、30日、31日和1923年1月2日、4日、6日、8日、9日、10日、13日、16日曾口授的事实。

在所有这些“口授内容”（福季耶娃只说出了它们的“标题”）当中，引人注目的有列宁1922年12月22日口授内容的这样一个“标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就机密问题口授福季耶娃”（着重线为作者标注）。只能做这样的猜测：列宁在前面指出的那些日子里口授的全部内容或者至今仍保存在前苏共中央的某个档案馆里（当然，1991年秋天以后档案馆已更名），或者确实被烧掉了。不过，以上所说的一切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种学术上的假说。

因此，本书作者走了另外一条路：只以不容置疑的、未被篡改过的文件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结论。例如，我在“被烧掉的”列宁1922年12月22日的口授内容中，发现了唯一保存下来的一份由列宁的秘书亲手做的记录。这准是因疏忽大意而在1970年由苏共中央档案馆转入中央党务档案馆的。

这份“记录”的内容与《列宁全集》第45卷中发表的列宁“遗嘱”不同（1922年12月22日的记录与23日的记录衔接不上）。根据发现的这份文件及其他一些文件，我得出了如下结论。

众所周知，1922至1923年间，病入膏肓的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为争夺俄共（布）中央的权力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获胜。然而，总书记篡改列宁那些作为“遗嘱”而闻名于世的文件，恰恰是这场斗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篡改的手法极为绝妙，乃至托洛茨基始终未能完全了解列宁实际上留下了什么样的遗嘱。不仅如此，列宁当初到底口授了什么内容，至今仍然是个秘密。因此，

全世界都被欺骗了两次：第一次是在 1926 年，当时全世界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遗嘱”的关键段落，内含对包括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在内的俄共（布）“领袖人物”的“鉴定”。

第二次是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1956 至 1957 年），按照传统先向党的高层人士，然后向整个前苏联通报了“遗嘱”的内容。

然而，事情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当然，搞秘密活动和散布假消息一贯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支柱之一。由于俄罗斯和外国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目前这一论点已被广为接受。而拿出篡改文件的证据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的工作宗旨恰恰就是要拿出证据。毫无疑问，这项工作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并吸收一些笔迹专家和文献研究专家。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

# 目 录

序 言 .....	( 1 )
引 言 .....	( 1 )
第一章 篡改 .....	( 4 )
第二章 突破封锁 .....	(23)
第三章 最后的尝试 .....	(33)
第四章 开创先例 .....	(49)
第五章 故伎重演 .....	(58)
第六章 马克斯·伊斯曼“事件” .....	(88)
第七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6年7月联合全会 .....	(121)
第八章 反对派在斗争 .....	(159)
第九章 马克斯·伊斯曼的胜利 .....	(170)
注 释 .....	(182)
附 录 .....	(195)



# 引 言

有关弗·伊·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的论著数量很多。从1922年12月底至1923年3月初，列宁在重病中口授了这些书信和文章。在列宁口授的重要书信和文章中，有一篇直到1956年才在苏联发表，他在其中给自己最亲密的几位战友作了鉴定。正是这篇笔录常被人称作列宁的“遗嘱”。然而，他的妻子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列宁在生病过程中还能够说话的那段时间里所口授的一切，都是政治遗嘱。

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一种见解：列宁在1922年底至1923年初口授的内容，特别是通常被称作“遗嘱”的那部分内容，后来被斯大林加以编辑和篡改了。我认为，我所发现的那份笔录原稿证明，列宁的著作被部分篡改了。篡改的手法极为绝妙，以至于托洛茨基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明白，他所看到的列宁1922年12月23日第一次口授的那份最重要的文件是经过编辑的，而不是原件。斯大林的篡改技巧和散布假消息的技巧还会长时间地令历史学家们吃惊。在这方面，还有一个例

证也很典型。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存有全俄肃反委员会在1918年6月专门伪造的一份案卷，它涉及杀害俄国最后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兄弟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一案。而篡改列宁的文件则干得更为巧妙。

本专著的课题是揭示这一篡改行为的秘密，介绍20年代在俄国围绕是否发表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的问题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当列宁病情严重，并且已不能再控制事态的时候，他的战友们趁机互相隐瞒列宁最后的文件，不过，首先是向托洛茨基隐瞒。在围绕列宁“遗嘱”展开的复杂而曲折的斗争中，形成、发展并最终繁荣起来一种被托洛茨基学究气地称为斯大林篡改历史“学派”的东西。其实，我下面列举的一些事实表明，托洛茨基本人在围绕列宁的书信和文章而展开的激烈斗争中也是一个很高明、很强硬的对手。

作为本专著的作者，我不认为列宁写下的就是政治遗嘱。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自己，为自己的妻子，为自己的政治路线而斗争。他甚至在弥留之际还在准备提交给党的例行代表大会的报告。

列宁去世后，他的报告成了高度机密。直到1956年，也就是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去世3年后，报告的最后片断才被党员所知。

列宁临终前考虑的是在他之后将要掌权的那些人。不过，他显然没打算让自己提交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成为政治遗嘱。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主要是根据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前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文件写成的。

# 第一章 篡 改

篡改列宁政治“遗嘱”的秘密产生于列宁开始口授自己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日子里。在随后的年代里，直至前不久，一直有种说法，即列宁在1922年12月最后几天口授的内容后来被歪曲了，但是却没有能用文件证实这一点的直接事例。最终这种事例还是出现了。它们说明，斯大林在从列宁秘书处得到列宁口授内容的文本后有机会对其加以编辑。借助于文件的原件就可以证明其中的一次。下面的陈述目的不仅仅是确认篡改载入史册的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份文件的事实，而且还要查明导致这种做法的原因。

1970年，一页手稿从苏共中央总务部转到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该手稿是列宁1922年12月23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起始部分的笔录。这份文件的珍贵性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

众所周知，《给代表大会的信》所包含的全部内容都是根据打字稿发表的。而这里谈论的这份文件是手写

稿，它是由阿利卢耶娃\* 亲手记下来的。可见，目前这是列宁秘书处工作人员亲笔记下来的、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口授的内容的唯一手稿原件。

决定文件手稿珍贵性的另一个因素是，它的内容与《列宁全集》第45卷中发表的文件不同。

不同点有两处，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打字稿是这样的：

## 给代表大会的信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我想，为

---

\* 娜·谢·阿利卢耶娃（1897—1932） 斯大林的妻子，参与了《值班秘书日志》的记录工作。正是她在1922年11月21日最先开始记这个日志的。她在日志中做的笔录是1922年12月18日中止的。很突出的一点是，接下去由沃洛季切娃做的笔录日期为1922年12月23日（见《列宁全集》第45卷第457—473页）。

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 50—100 个中央委员，而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

1922 年 12 月 23 日

玛·沃·记录<sup>(1)</sup>（此注见书后“注释”，以下类同）

请注意打字稿的第四段。<sup>\*</sup>这一段说：“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作者标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在手写稿中没有划线部分的话。这是同一份文件手写稿与打字稿之间的第一个不同点。当然，有还是没有上面划线部分的话会大大改变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对比一下第五段的打字稿与手写稿，那么句子意思的改变就更大了。

---

<sup>\*</sup> 此处和下面提到的打字稿均指的是《列宁全集》第 45 卷（343—344 页）上发表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记录稿。

我们看到，打字稿第五段是这样的：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作者标注）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在手写稿中，最后一句的结尾是：“……对党的所有‘评判人’产生过分大的影响。”

用了“前途”（在打字稿中不带引号）一词的句子虽然严整，但却是被篡改过的。这句话是按照“遗嘱”的特性加以编辑处理的。用了“评判人”一词的手写稿（这个词在稿中加了引号，这并非偶然）则符合公文特性和风格。

列宁到底称哪些人为“评判人”呢？列宁 1922 年 12 月 24 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如下内容对此作了回答。该部分内容是从这一段开始的：“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sup>(2)</sup>

在这段文字中（它在意思上和形式上都与上一段紧密相联），列宁把“评判人”具体地点了出来——奥登堡。在这个名字的后面是寄希望于在党发生分裂的情况

下复仇的政治侨民的代表人物。在一种情况下（使用“前途”一词），文章的表述风格是转文（要让我说，这是斯大林风格）。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典型的政论风格、列宁的风格。

关于为什么、出于什么原因对列宁的文章加以“编辑”，将在下面陈述。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另一份同样需要给予简要说明的史料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存有一套集成一卷的文件，这是在1956年筹备出版列宁的“政治遗嘱”期间收集的文件。文件中附有一张卡片（原件），上面写有如下文字：“莫斯科，1923年6月7日，呈报加米涅夫同志，现寄出古比雪夫同志答应为党的档案馆提供的材料。”（签名无法辨认）<sup>(3)</sup>

从中央监察委员会寄出的“答应提供的材料”，是1922年12月23日至29日列宁口授内容记录的几页打字副本。最初，这些材料中曾有1922年12月24日至25日的口授记录（“遗嘱”）。以下情况可证明，这份记录后来被收走了。列宁的文件副本附有一张目录。例如，关于12月23日的记录内容是这样写的：“向党代表大会提出两个建议。1.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至100人（作为加强中央稳定性的措施）。2. 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托洛茨基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在“目录”中还可看到：“第二封信。1922年12月24日。展开谈第一个建议：关于增加中央委员



的人数（评述）。”

可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古比雪夫在认真研究了列宁的口授记录后将它们交给了由加米涅夫控制的档案馆。这件事发生一年后，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向中央委员会正式转交了列宁的文件副本。按照党的所有正式文献的说法，这些文件此前遵照其作者的意愿一直“精心”保存在列宁秘书处和列宁的亲友那里，而且装在用火漆加上封印的信封中。

综上所述，现在来论证一下本章开头提出的论点。在历史学家当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列宁决定不让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了解自己1922年12月23日第一次口授的内容。依我看，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起初列宁准备给即将召开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发去好几封信——他通常都是这样做。但是，斯大林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具体行动迫使他作出了另外的决定。

实际上，在《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1922年12月23日），引人注目的是列宁向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发出呼吁的形式本身。他用了这样一些词语：“想同你们谈谈”，“我想提请”，“我想”。换句话说，尽管健康状况极为糟糕，列宁（就像在党的十一大召开前那样）还是开始了起草给例行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工作。